

小洋鬼子

——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
Little Foreign Devil

[加] 德斯蒙德·鲍尔 Desmond Power 著

谢天海 译

刘海岩 校订



天津通史编译丛书

万新平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小洋鬼子

——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
Little Foreign Devil

[加] 德斯蒙德·鲍尔 Desmond Power 著

谢天海 译

刘海岩 校订

天津通史编译丛书

万新平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洋鬼子：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 / (加) 鲍尔
(Power, D.) 著；谢天海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01-06379-9

I. ①小… II. ①鲍… ②谢… III. ①回忆录—英国
—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058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3 插页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3,500

定 价：40.00 元

总 序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编纂《天津通史》是天津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久已期盼的文化盛事。2004年12月,在纪念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际,天津市委决定正式启动《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可以说这是跨入21世纪后天津历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划时代的文化建设工程。

天津通史作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完整把握天津历史发展的脉络,全面分析天津历史变迁的特征,深入总结天津发展的规律,深刻论述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项工程对进一步推进天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而提高天津城市的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纂地方通史历来是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近年来,地方通史编纂工作方兴未艾,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市都相继编纂出版了大型地方通史。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点。在古代,天津从军事重镇逐步成为畿辅名城,具有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重要典型意义。在近代,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百年中国看天津”,确非虚言。比如,天津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战略要地,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是近代中国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是近代中国海陆军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北方城市近代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白区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和工商业经济中心。中西社会思潮在此交汇,新式文化教育由此兴起,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巨匠聚集津门,从

而形成吸纳百川、包容中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底蕴。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天津克服了国内仅见的艰难曲折,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三五八十”四大奋斗目标和“三步走”战略后,经过全市人民的顽强拼搏和艰苦奋斗,不断取得辉煌的成绩,迎来了天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滨海新区的发展被正式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天津将引领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并将成为渤海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为全球所瞩目。

回顾历史,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建基于古老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逐步向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天津占有突出的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拥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发展与曲折、突破与障碍,都集中反映到天津这一历史文化名城身上,致使天津的演变成为中国城市变迁的重要代表。通过编纂《天津通史》,对天津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深入地研究天津、认识天津、展示天津,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展示中国。

编纂《天津通史》,是一项汇集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系统工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开拓和创新。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力求在理论构架、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史实资料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必须组织一批素质优良、功力深厚、作风扎实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因此,从专题研究着手,从基础资料起步,是做好该工程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对天津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天津地区变迁的历史全貌,真实地加以展现和记述,深入地总结天津城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进程。不仅要研究和叙述天津的规模、形制、建筑和环境,更需要研究和分析其经济特征、文化渊源、社会结构、人口变化、居民素质等发展和演变的内涵;不仅要注重天津与乡村、市镇乃至环渤海地区、西北、华北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关注天津与国内其他区域中心城市,乃至东北亚及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

不仅要着重叙述天津本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还要反映出不同时期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要高度重视天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应该看到,前人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天津历史资料,但从编写大型多卷本通史的需要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历代实录、通鉴、类书、文集、方志中有关天津地区的史料,开埠以来各个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散失在国外档案馆和私人收藏的各国租界、领事馆、教会的文件、报告、调查、私人日记等,近现代中外文报刊杂志的记述,以及考古和现存文物资料等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征集整理工作,以使《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建立在坚实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

为此,我们根据《天津通史》编纂工作的需要,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天津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汇编为“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将经过专家整理的较为珍贵的中文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选编为“天津通史资料丛书”;将征集到的有重要价值的外文历史档案和书刊资料编译为“天津通史编译丛书”。这三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有利于提高《天津通史》的研究和编纂水平,同时可以把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时介绍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深入地了解天津,认识天津,研究天津,将发挥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LITTLE FOREIGN DEV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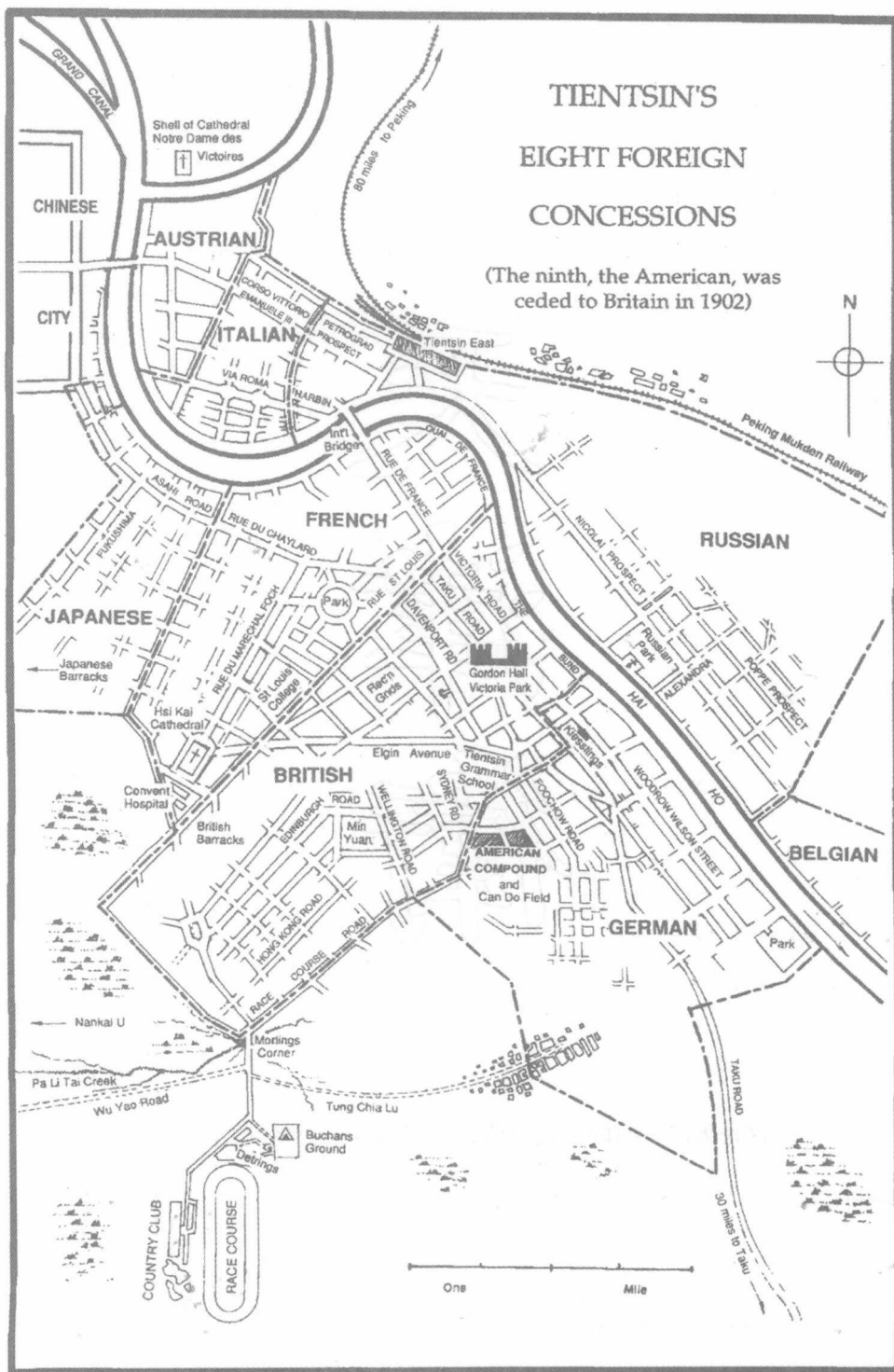
Desmond Power



Pangli Imprint

天津衛

这是天津古时的正式称谓,意为“保卫天子渡口之城堡”。



Copyright © 1990 by Desmond Power

天津八国租界图(第九国租界美租界 1902 年并入英租界), 作者绘制

居住在通商口岸天津和上海的那些所谓“租界”内的外国人,过着极其舒适安逸的生活。他们不用纳税,凌驾于中国的法律之上;他们公开地在租界大量派驻军队,组建巡捕,以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对于居住在租界的第三代外国人来说,他们唯一知道的只有这些特权天下,因此当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他们被赶出租界时,所受到的打击格外大。他们所受到的鄙视,也像他们的祖辈被发动血腥起义的义和团所鄙视的那样。

吃麪不攔醬
炮打交民巷
吃麪不攔滷
炮打英國府
吃麪不攔醋
炮打西什庫

这是中国的自由斗士——义和团 1900 年起义时的战斗口号。

前言

《小洋鬼子——一个英国人家族在华生活史》一书最初译自 1996 年的英文版,后来又根据作者提供的修订稿作了校订。英文版的标题是《小洋鬼子》,中文版的副标题是译者加的。

《小洋鬼子》的作者德斯蒙德·鲍尔 1923 年出生于天津,1946 年离开中国,先后在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居住,最后定居在加拿大。他是《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①一书的作者布莱恩·鲍尔的胞弟,比布莱恩小 5 岁。当 1936 年,布莱恩离开天津去伦敦读大学时,德斯蒙德仍在读中学。一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德斯蒙德和他的一家,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同中国人民一样,陷入了残酷的战争漩涡。从封锁租界,到集中营被囚,历经苦难岁月,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本书和《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一书,在叙事时间上前后衔接,记述了从民国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英国家族在中国城市的生活史。

读过一些中国城市历史著作的读者会感到,目前诸如上海、武汉、天津等存在租界的城市,已经出版的历史著述对租界中的外国居民要么所言不详,要么只是谈到那些外国名人,上海的哈同、天津的德璀琳等等。而且,谈到租界的外国人,大都以殖民者、淘金者一概论之。至于那些普通的西方人是如何从欧洲、美国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谋生的,他们在中国生活的真实状况如何,我们知道的很少。即便在西方学者的历史著述中,正面谈及这些来东方的普通西方人的也不多。

然而,要想真正的了解租界的外国人社会,对普通外国居民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研究租界社会外国人阶层的一个可靠途径,就是通过他们出版的回忆录,或者是书信、日记等等。这就是本书翻译出版的初衷。作者

① 2007 年 5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撰写这本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不仅凭借自己的记忆和保存下来的个人资料，也搜集了许多相关的历史资料，还通过与当年同时生活在天津的亲戚朋友的沟通，获取或订正了不少史实。作者通过一家三代从欧洲来到中国，在中国城市创业安家，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直至战后离开中国的历史，使我们能鲜活地认识那些当年曾与我们的先辈生活在同一城市同一街区的洋邻居们。

作者父姓鲍尔，所以我们可以称其为“鲍尔一家”。作者的父亲斯蒂芬·鲍尔，来自爱尔兰西部的克莱尔郡。19世纪中叶，爱尔兰还在英国的统治下，人口多数为信奉天主教的贫苦农民，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大地主则多居住在英格兰。连年发生的马铃薯病害，造成了罕见的大饥荒，饥饿使爱尔兰的人口锐减四分之一，人们纷纷逃离故乡，远走海外谋生路。斯蒂芬的父亲，也就是作者的祖父托马斯·鲍尔在家乡奎林种着一片土地。托马斯夫妇一共生了十五个孩子，有两个夭折。养育十三个孩子的沉重负担，光靠种植马铃薯是不可能的。托马斯同时制作皮靴出售，还承包了一段政府的道路维修。孩子们长大后，纷纷离家外出谋生。最终，三个去了英格兰，五个移民去了美国，两个到了中国，只有三个人留在家乡。

这一时期，出生于北爱尔兰的罗伯特·赫德成为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在他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大量雇用欧洲人任职。优厚的薪水吸引着穷困的爱尔兰年轻人前往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谋求发展。

斯蒂芬·鲍尔生于1887年，是家中的第12个孩子，毕业于爱尔兰的一所教会学校。他的哥哥(托马斯的四子)，从英国军队退役后在天津海关工作的杰克·鲍尔极力鼓励毕业后没有工作的弟弟前往中国。于是，斯蒂芬申请到了中国海关的职位并来到了中国。除了短期在秦皇岛和山海关海关外，斯蒂芬主要是在天津海关任职，这样他就在天津安了家。

如果说，斯蒂芬是来东方谋求解脱贫困的爱尔兰穷小子，那么他的妻子格蕾丝·达克就已经是东方成功者的第二代了。格蕾丝的父亲乔治·达克生于英国，但乔治的父亲，也就是格蕾丝的祖父却是法国人。他就是兰伯特·达克，一个出色的法国蜡像制作人。19世纪中叶，他离开法国到英国伦敦为杜沙夫人蜡像馆制作蜡像，从此定居在英国。他在为蜡像馆工作

的同时,还制作牵线木偶并演出木偶剧,并因此而出名。^①

他的六个儿女几乎都没有上过什么学校,而是全家组成家庭剧团巡回演出,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操纵木偶或为角色配音。乔治·达克是他的长子。达克木偶剧团在英国成名后,曾到法国巡回演出。其后,他们又前往英属殖民地南非、印度、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巡回演出。1893年,正当他们的巡回演出不断成功之际,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所有的木偶及演出道具,不久兰伯特·达克又病逝于澳大利亚星期四岛。父亲死后,家庭剧团便告解散,兄弟姐妹各奔东西。

1894年,乔治·达克在香港演出时,认识了英格兰歌手艾格尼丝·曼尼并与之结婚。两年后,他们的女儿格蕾丝在北京出生。当他们1900年将格蕾丝留给伦敦的亲戚,回到北京准备开始新的事业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他们躲进了使馆区。乔治·达克与其他三名外国人英勇地骑马穿过义和团的封锁,前往天津报警。乔治·达克从天津曾跟随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而遭到失败。天津城被八国联军占领后,他又作为天津租界自卫长枪队的一员,跟随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并在使馆区与妻子艾格尼丝劫后重聚。

在这次劫难中,他们赖以谋生的木偶和道具再次被毁。在他们帮助围困期间结识的朋友恢复北京饭店时,发现了旅馆业的潜在市场。于是,达克夫妇从英国接回女儿后,来到天津,在英租界当时最繁华的马路道建起了“搭客饭店”。尽管仅仅一年后,饭店遭遇大火,损失殆尽,但是乔治·达克锲而不舍,终于获得成功。到了民国时期,“搭客饭店”已经成为天津颇有名气的旅馆了。

达克一家成为租界社会的成功者。他们的独生女儿格蕾丝·达克被送到当时中国沿海一流的女子教会学校——青岛圣灵修道院学习。她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德语,英文、法文和音乐等课程也获得优异的成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格蕾丝不情愿地回到了天津。

斯蒂芬·鲍尔热烈地追求达克家的女儿,并最终赢得格蕾丝的爱情。但是,他们的婚姻遭到达克夫妇的反对,他们怎么能答应把他们的千金嫁给在海关跑外勤的爱尔兰“穷小子”!勇敢的格蕾丝不顾父母的反对,决定与斯蒂芬结合。他们的婚礼于1915年6月15日在法租界的圣路易教堂

^① 约翰·菲利普斯:《都柏林的达克》,《戏剧指南》第48卷第1页。

举行,在英租界的皇宫饭店举行婚宴。根据当地的报纸报道,有 50 人参加了婚礼。达克夫妇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而是由斯蒂芬的哥哥杰克充当新娘的父亲,将格蕾丝交给了弟弟斯蒂芬。

读到这些,我们不由得被鲍尔·达克家族曲折浪漫的历史吸引住了。然而,当我读完了《小洋鬼子》的全部书稿后,心里产生了不少疑问。为什么布莱恩的书中没有提到他的弟弟妹妹,包括德斯蒙德?为什么布莱恩提到家中的男仆宋哥哥,而德斯蒙德却提到秀桂祥,等等。我写电子邮件给居住在温哥华,已是耄耋老人的德斯蒙德·鲍尔,向他请教。对出版中文本的事,满怀热情的老人不辞辛劳,专门撰写了长达 20 多页的文字,分析了两书内容的不同,提供了书中没有的许多历史细节和资料。对布莱恩书中的一些内容,德斯蒙德先生提出了批评。例如,他认为布莱恩为了突出他自己与一姐之间关系的描写,而忽略他们兄弟姐妹不提,甚至对母亲都有所贬抑。

德斯蒙德先生对他的母亲,被他们兄弟姐妹幽默地称为“太太”的格蕾丝极为赞颂,称她为伟大坚强的母亲。他的讲述,使我们对鲍尔一家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斯蒂芬和格蕾丝婚后的生活是快乐和满足的,他们先后有了四个儿子:帕特(1916 年出生)、布莱恩(1918 年出生)、乔斯林(1920 年出生)和德斯蒙德(1923 年出生)。1919 年,斯蒂芬与海关的雇用合同到期,他辞去了海关的工作,加入了加拿大太阳人寿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充任保险代理。新的职业使他的收入迅速增加,不断获得公司奖金。当时,天津的英文报纸还刊登了保险公司给斯蒂芬的表彰信。^①

然而可悲的是,伴随着事业的成功,他也沾染了保险业的职业陋习——酗酒。酒精彻底击败了斯蒂芬,使他迷失了自我。他丢掉了工作,也失去了公众对他的尊重。由于酗酒,他已经无法搞清楚他开出的保单,不能解释清楚保险费的支配,因此遭到公司的控告。他被逮捕并受到审讯。此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坚强的格蕾丝,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理清了丈夫混乱的底账记录,在审讯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斯蒂芬被证明是清白的,被宣告无罪释放。尽管如此,斯蒂芬不愿背负着他给家庭带来的耻辱而生

^① North China Star, July 14, 1921.

活,1923年底他去了上海,准备开创新的事业。1924年7月28日,斯蒂芬因中暑而猝死在黄包车上。三个月后,丧夫的悲痛还没有完全过去,格蕾丝盼望已久的女儿斯蒂芬妮出生。但是,快乐没有太久,仅仅六周后,一直给予她爱并在经济上支持她的父亲乔治·达克死于哮喘病。最后一次的残酷打击是一年后,一岁的斯蒂芬妮因医生的失误而不幸夭折。在美国和爱尔兰的亲戚以及周围的朋友都鼓励她重新振作起来,并提出可以帮助抚养她的四个孩子。但是,自尊而坚强的格蕾丝不会答应,她要自己抚养四个儿子长大。

格蕾丝又找到了新的丈夫吉姆·兰伯特,而且又生了两个孩子托尼和贝蒂。但是,由于吉姆·兰伯特是从英军复员的下士,缺乏专业技能,找不到好的职业,格蕾丝必须外出工作养家。她在天津的汇丰银行找到了秘书的工作。她无可指摘的英语能力,动听准确的口语,使她成为一名颇有能力的秘书。流利的汉语,又使她可以协助银行的英国人与一个英文字都不会的买办讨论问题。她1925年加入汇丰银行时,那里一共有59名人员,全部是男性,她是银行唯一的女性。

格蕾丝也是租界社会活跃的人物。她协助教会组织唱诗班,写作儿童剧在刚刚成立的东方广播电台播送,并充当导演承担主角。她导演的“克里斯蒂歌唱团”在英国俱乐部多次演出,四个儿子扮演黑人,他们的同学也参加了演出。在音乐会上,她弹奏钢琴伴奏,大儿子帕特弹奏班卓琴,其他几个孩子参加演唱,成为颇受欢迎的节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又协助组织爱国音乐会筹募战争捐款。即使被关到潍县集中营后,格蕾丝仍然是受欢迎的法语教师。同时,还帮助组织音乐演出,为修女和囚犯唱诗班演奏风琴。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鲍尔家的孩子们就专程到天津说服他们的妈妈离开中国,回到英国生活。在英国生活期间,她曾在卡苏顿女子学院教授法语,后来又跟随已经成为成功的舞蹈演员的女儿贝蒂在欧洲巡回演出,游历四方。同时利用四十年前在青岛修道院学会的刺绣手艺,协助女儿制作演出服装等。

以上这些讲述,如果与布莱恩·鲍尔的《租界生活》一书对照阅读,可能会发现内容上的差异甚至矛盾。如何理解或解释这些矛盾的出现,对我

们阅读历史回忆录会很有助益。这其实是现代历史学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记忆”与“真实”之间的不同。

任何一种“真实”都是无法“再现”的。历史学家借助时代的话语,向读者诠释历史。“亲历者”对历史的回忆,则是凭借自己的“记忆”,向读者讲述往日所经历的人与事。本书作者在谈到他的写作动机时说,当他的大半生已经过去,他就想要写一本书,“讲述我在中国的出生和成长,把这一切倾诉出来,使我得到解脱”。

然而,亲历者在离开他生活其中的特定历史环境后,在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往往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同一个人对同一段经历的回忆每一次都不相同”。^①

而且,“记忆”在经过岁月的打磨后,也会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不自觉地“修正”某些记忆。而这个经过“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历史真实相差得非常遥远。

我想,这就是鲍尔兄弟回忆录中出现一件事情记录不一,甚至出现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还有“记忆”的“误差”或对历史的误引,也有讲述者受到历史学家们自以为是的结论的误导。如布莱恩在书中谈到他的外公和他大讲历史时,就将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与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混淆了。

两本回忆录中都有多处谈到鲍尔家的华人仆佣,这是因为年少时的他们,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家中的仆人或阿妈了。然而,他们共同谈论的最多的只有一姐,此外布莱恩谈到男仆宋哥哥,德斯蒙德却谈到男仆秀桂祥。德斯蒙德先生介绍了他家雇用仆佣的历史,这会有助于我们分析两书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在租界时代,雇用居家仆佣是租界居民家庭普遍的生活方式,在外国人的家庭尤其是这样。斯蒂芬死后,尽管格蕾丝要供养几个孩子,秘书的薪水也并不高,但是由于仆佣的工钱极为微薄,使鲍尔家仍能雇得起几名男女仆佣。

①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鲍尔家住在咪哆士道时,家境尚好,家中雇用的仆人也最多。“一号男仆”^①姓卢,英文名斯图尔特,其他仆人称他“管事的”,鲍尔家的孩子们则称他“卢爷”。卢爷在其他仆人面前颇有尊严,平日总是身穿长袍直垂脚踝。他负责接待客人,摆饭桌上菜并指挥其他仆人。卢爷直接指挥的“二号男仆”,就是布莱恩所称的宋哥哥。他负责扫地、洗碗和搬运东西等粗活。厨房则由一号厨师掌管,人称他“大师傅”。他的助手是“二师傅”,是干厨房粗活的男佣。

此外,负责照看年纪小的孩子,兼管洗涤缝补衣物的女佣,称“阿妈”。帕特年幼时,曾雇用一位杨姓阿妈,格蕾丝称他杨奶奶。她离开后,格蕾丝又雇用了一名虽然身材小,但更吃苦耐劳的广东籍阿妈,这就是一姐。

1930年搬家时,卢爷和宋哥哥被辞掉了,只有一姐以及她的儿媳妇一起到了新的住宅,孩子们叫她姐姐。1932年,鲍尔家再次搬家时,一姐的儿子阿金、女儿阿坤也搬来一起住了。同时,又雇用了新的一号男仆和二号男仆。他们是兄弟俩,秀月祥和秀桂祥,来自北京,会读书写字。当鲍尔家再搬到西德尼道时,住宅虽然小多了,一姐一家仍然和他们住在一起。只是,一姐视力减退逐渐失明,姐姐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秀氏兄弟则有一个离开,只剩下弟弟秀桂祥充当一号男仆,一姐的儿子阿金成了厨师。

从对仆佣的记述中,显然也可以看到“记忆”的“差异”。布莱恩年幼时打交道最多的是宋哥哥,而当宋哥哥离去,秀桂祥进入鲍尔家时,布莱恩已是青年,不久就离家前往伦敦了。而尚在年幼的德斯蒙德,记忆深的显然不会是宋哥哥,而是陪伴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秀桂祥了。

尽管两本书中对仆佣的回忆多有“差异”,但是无论如何却让我们看到,社会地位低微的华人仆佣,不仅是鲍尔一家的重要角色,也对作者的早年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布莱恩与一姐的感情非常深厚,德斯蒙德与秀桂祥甚至成了好朋友。

在鲍尔家,母亲要外出工作,孩子们几乎整天和仆人一起生活,吃中国饭,用筷子,甚至吃饭的样子也受到仆人的影响。他们学中国仆人说的顺口溜,玩中国孩子喜欢的游戏,粘知了、斗蛐蛐、放风筝。这在当时租界

① 租界外国居民对中国仆佣普遍使用这种有辱人格的称谓。